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五十三辑 2011.3

聂辉华 哈佛导师的武林大会

封进 五彩缤纷的女性经济学

黄有光 经济学教材的问题——与李俊慧商榷

方颖 关于计量经济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高明华 杜雯翠 揭开国有垄断企业「美丽」的面纱

董新兴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婚恋

谢明干 从过中秋吃月饼说开去

蒲勇健 摊贩与城管冲突的经济分析

张宇燕 挑战与应战

陈宪 新的均衡和新的政府干预

张清津 来世概念的缺乏与中国人的经济行为

俞炜华 段连宇 人类婚姻的生物本质

徐康宁 有没有坏的市场经济？

蔡晓峰 中国银行百岁纪念杂议

王勇 加里·贝克尔教授，祝您八十寿辰快乐！

朱玲 老友贝格曼

邱斌 纽约的实体经济

高新军 参加美国马萨诸塞州议会听证会有感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也有文化

张清津

现代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对文化这种东西敬而远之。他们喜欢的是那些能用尺子量、能论斤称的东西，对类似文化这种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看似近在咫尺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唯恐避之不及。

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文化不仅影响到人的偏好，而且是诺斯所谓的非正式约束，形塑着个体的经济行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偏好与经济行为。试想一下，假如有一对双胞胎，刚出生时其偏好、智商等因素完全相同。他们一生下来，就把他们分开，一个放在温州，一个放在济南。很容易就能够想象出来，等他们长到18岁，肯定会有着非常不同的偏好或经济态度。我们可以把文化对个体的影响称为文化资本。

文化不仅是民族社会的标识，而且和制度一样是人类社会须臾难离的。显然，文化和制度一样，有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既然文化具有福利意义，那么不同的文化所增加的社会福利自然也不一样。这就使得文化有了一定的经济学意义。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多东西都是要有高下之分的，因为他眼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效率。对于文化比较，以前的学者手里虽然缺乏这样一把精确的尺子，但这种尝试却从来没有停止过。韦伯的新教伦理说，就暗含着基督新教的经济效率优于天主教的假说。自从科斯发现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对文化的分析，似乎就有了新的武器。他们发现，文化和制度一样，也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现代的很多学者开始拿着经济学武器，闯入了文化领域。如Luigi Guiso等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资料对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教徒的经济态度的比较；Timur Kuran对中东地区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剖析；Greif对中世纪马格里布人的集体主义传统与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传统对贸易和制度演化的影响的分析等。于是，现代经济学开始有了文化。

已故杨小凯先生曾说，多少模型也不如哈耶克的理论重要。但愿偏爱模型的经济学家，不会长期冷落文化。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研究员）



经济学家茶座

第 **53** 辑
2011.3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约编辑
李淑娟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锥亚龙

目 录

□ 卷首语

张清津 经济学也有文化 / 001

□ 学界万象

聂辉华 哈佛导师的武林大会 / 004
封进 五彩纷呈的女性经济学 / 009
陆铭 说审稿 / 013
赖德胜 大学的文化 / 017

□ 学问聊斋

黄有光 经济学教材的问题——与李俊慧商榷 / 020
方颖 关于计量经济学教育的一些思考 / 023
刘福寿 经济学概念被“地下化” / 025
胡怀国 契约精神：经济学的远亲与近邻 / 028
皮建才 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 033

□ 国是我见

高明华 杜雯翠 揭开国有垄断企业“美丽”的面纱 / 037
林跃勤 超越美国：中国何日美梦成真？ / 041
詹宇波 中国工资议价制度变迁的未来展望 / 046

□ 生活中的经济学

董新兴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婚恋 / 051
谢明干 从过中秋吃月饼说开去 / 054
蒲勇健 摊贩与城管冲突的经济分析 / 058
李增刚 “娶男人”：一种特殊婚姻形式的起源与发展 / 060
曹淑江 比较优势、组织内分工与人生的择业、教育选择 / 062

□ 经济随笔

张宇燕 挑战与应战 / 067

- 陈 宪 新的均衡和新的政府干预 / 069
 张清津 来世概念的缺乏与中国人的
 经济行为 / 072
 徐昌生 没有自由经济，城市更加拥堵 / 077
 俞炜华 段连宇 人类婚姻的生物本质 / 080
 董国政 人类生活，空间几许 / 083

□ 经济评论

- 徐康宁 有没有坏的市场经济？ / 087
 蔡晓峰 中国银行百岁纪念杂议 / 091
 刘宝宏 网络团购为何陷阱密布？ / 095
 李俊慧 地震经济学 / 101
 郭宇宽 张五常的美丽误会 / 106
 吴国东 减少死刑是否会导致犯罪率上升？ / 112

□ 经济学人

- 王 勇 加里·贝克尔教授，祝您八十寿辰快乐！ / 115
 朱 玲 老友贝格曼 / 121
 徐秋慧 命运多舛的经济学家 / 126

□ 经济史话

- 孔志国 民毋伤，农益劝 / 131

□ 他山之石

- 邱 斌 纽约的实体经济 / 133
 高新军 参加美国马萨诸塞州议会听证会有感 / 138
 祝曙光 柬埔寨的华商与华文教育 / 142
 周 勤 美国式的奢侈和浪费 / 148
 刘 畅 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生 / 154

□ 对话

- 李淑娟 传统能源企业要以创新促发展
 鲁泰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 (第53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978-7-209-05906-0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
 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第197304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Email: 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印刷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4.00元



哈佛导师的武林大会

聂辉华

让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

——题记

一、江湖号令

经济学的江湖派系林立,竞争激烈,往往各领风骚几十年。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业内人士一旦提到某个学派,必定提到几个大佬。这些大佬是这个学派的顶尖高手,他们创立了这个学派的分析框架,甚至仍然指引着这个学派的发展方向。例如,提到信息经济学,不能不提阿克洛夫(Akerlof)、斯彭斯(Spence)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到机制设计理论,不能不提赫维茨(Hurwicz)、马斯金(Maskin)和梅尔森(Myerson)。并且这些人如今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提到不完全契约理论,就不能不提格罗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莫尔(Moore)。现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已经成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产业组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律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在由博尔顿(Bolton)和德瓦垂朋特(Dewatripont)撰写、MIT出版社出版的《契约理论》教材中,不完全契约理论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奠定不完全契约理论基本框架的,是先后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格罗斯曼和哈特教授1986年发表的《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理论》,第二篇是哈特和莫尔教授1990年发表的《产权和企业的本质》。作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哈特教授也是近年来诺贝尔奖得主的热门人选。

不完全契约学派历经二十余年修行,追随者众,遍布天下,在经济学江湖可谓一大流派。这次,让这一流派风云际会的,是一封由阿庚(Aghion,哈佛大学教授)、德瓦垂朋特(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勒格罗(Legros,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和津加莱斯

(Zingales, 芝加哥大学教授) 联名签署的邀请函。邀请函说, 今年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论文发表25周年, 为了讨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巨大成就和未来发展, 我们决定于6月24-2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为期两天半的会议(“Grossman and Hart at 25”)。号令一出, 震动江湖。几乎所有与不完全契约理论有关的世界级学者都参加了此次盛会, 除了论文的两作者格罗斯曼(原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和哈特(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 这些高手包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庚(哈佛大学教授)、博尔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姆斯特朗(Holmstrom, MIT教授)、莫尔(爱丁堡大学和LSE教授)、罗伯茨(Roberts, 斯坦福大学教授)、施莱佛(Shleifer, 哈佛大学教授)、斯特恩(Stein, 哈佛大学教授)、梯若尔(Tirole, 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以及津加莱斯(芝加哥大学教授)等五十多位国际知名学者。想想看, 在这个领域, 除了这些高手, 我们还会记得谁? 高朋满座, 高手云集, 高端对决。这是一次真正的武林大会!

武林大会选择在布鲁塞尔召开可谓用心良苦。首先, 布鲁塞尔作为比利时王国的首都, 也是“欧盟首都”, 可以算是欧洲的心脏。最重要的是, 这里离瑞典比较近, 同时离美国比较远。套用一句网络用语来说就是, “你懂的”。其次, 6月的布鲁塞尔, 气候宜人, 非常凉爽, 实乃居家旅行之胜地。本次盛会的东道主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BLU)的欧洲经济学与统计学高级研究中心(ECARES), 是一个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欧洲经济学研究重镇。

这次盛会当然是不完全契约领域的最高级别会议, 但会议只对少数人开放。除了受邀发言的50位知名学者, 另有40位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各国学者, 还有10位是世界各地的博士生。除了少数几个工作人员, 我甚至没有在现场看到一个来自当地大学的旁听者。我于2009~2010学年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师从哈特教授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 因此荣幸地成为中国内地两位受邀学者之一(另一位是上海交大的费方域教授)。不得不提的是, 在1999年, 不完全契约学派与完全契约学派开展了一次巅峰对决, 多位顶尖高手参与了那次华山论剑。如今, 十载已过, 不完全契约学派的众多高手居然要和完全契约学派的领袖人物共聚一堂, 莫非又要掀起一阵刀光剑影?

二、高手过招

两天半的会议安排得滴水不漏,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紧凑的学术会议。会议总共分为十一个单元, 内容涉及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企业边界、企业内部组织、公司金融、理论基础、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公共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领域的进展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单元通常分为三个部分: 先是由一位权威教授综述不完全契约理论在



某个主题上的研究现状，然后由几位学者对综述进行点评，最后另外一些学者通过讨论的方式探讨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这个主题上的未来发展趋势。

6月24日中午12点，参会代表陆续到达BLU的商学院新楼进行注册。来自五湖四海的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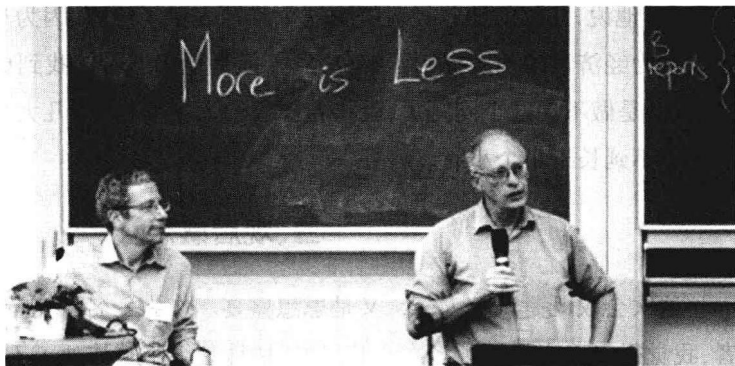


哈特教授(右)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

表们三五成群，一边吃着简易午餐，一边欢快地聊天。看上去，大部分人都相互认识，一见面就谈论熟人熟事。如果你谁都不认识，就很难找到熟悉的话题，未免显得有些生分。还好，我在美国认识的几个学者也来了，不然就会略显尴尬。下午1点钟，会议正式开始。在德瓦垂朋特教授代表东道主做了简短致辞之后，莫尔教授介绍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影响。不得不说，莫尔教授的演讲极具感染力。首先，他很幽默。哈特及其合作者的两篇文章按作者音序排列是Grossman-Hart-Moore（即GHM模型），也可简写为Grossman et. al.。莫尔说，在这个简写里，他是al（酒精），而哈特变成了et（外星人）！听众顿时狂笑不止，连哈特本人都哈哈大笑。其次，他说话时声音略带夸张，并且手舞足蹈，令人怀疑他以前是不是演戏剧的。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德赛因(Dessein)综述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解释企业边界问题上的进展。接着，密歇根大学的拉方丹(Lafontaine)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评述了这个综述。她特别指出，不完全契约理论有些假设难以在现实中识别，并且有些现实的契约条款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解释。会议的详情按下不表。

当天下午的讨论直到晚上六点半才结束，然后大家从宾馆乘坐班车前往郊区一个特色饭店共进晚餐。班车停在一处茂密的森林里，我们下车后沿着两边点满蜡烛的小径步行到一个湖边，然后坐游船到达对岸的一个酒吧。到达酒吧的餐厅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按北京与布鲁塞尔6小时的时差计算，此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多。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基本上不用倒时差，但是架不住饥饿啊！按当地时间计算，晚上七点多也该吃晚饭了吧？但是会议代表们还是悠然地端一杯香槟，三五成群地讨论学术问

题,直到8点才入席。我寻思,该吃饭了吧?结果大家在饭桌上至少又聊了半个小时,才开始陆续上菜。边吃边聊,三道菜吃下来,我基本上没吃饱,估计是饿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左)和会议主角哈特教授(右)

了。到了10点左右,主角之一格罗斯曼教授致辞,然后是两个教授评论。内容肯定很风趣,因为大家都笑了,可是我笑不出来,只盼着他们早点说完以便侍者接着上菜。第四道菜上来之后,已经快11点了,大家似乎意犹未尽,但终于散席了。谢天谢地!等班车载我们回到宾馆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看上去半天的会议,实际上整整持续了12个小时。考虑到连喝咖啡的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学术问题,全天大家的脑袋就没有休息过。谁在国内见过这么玩命开会的?

不过,紧张的会议也有令人感动的温暖。饭后,晚风习习,略显寒色。在返回的游船上,在晦暗的夜光下,我看到瘦小的格罗斯曼紧紧地搂着娇小的发妻,默默地靠在游船的一角,听大家继续热烈地讨论学术。格罗斯曼在不到五十岁的黄金年龄,在学术生涯的巅峰时期急流勇退,从沃顿商学院讲席教授的职位上辞职下海,创办了QFS资产管理公司并担任CEO至今。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因为除了契约理论,他在金融领域的成果也非常显著,而且是1987年克拉克奖得主。也许很多人会为他、为经济学界感到遗憾。作为一名绝顶高手,面对江湖盛誉,面对世间浮华,也许他感到英雄寂寞,唯有独孤求败吧。个中滋味,何人能解?那晚之后,我再没有见到格罗斯曼教授。

第二天的会议是从上午9点搞到晚上12点。最热烈的讨论是关于不完全契约的基础问题。1999年,以马斯金和梯若尔师徒为代表的完全契约学派对不完全契约学派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们的文章、哈特与合作者及弟子西格尔(Segal)的两篇文章都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S)1999年的专辑上。虽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但是今天两派人马居然再次鏖战。马斯金和梯若尔认定在传统框架内无法找到不完全契约的坚实基础,西格尔从有限理性和增加激励约束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阿庚等人则试图通过引入一点点信息不对称来重新找回理论基础,莫尔也再度加入战团。连主角哈特也出



来发言。他说,几年前他曾经对解决这个难题表示了绝望,因为马斯金都得诺奖了,后来他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他仍然希望找到更简单的方法。他感慨地说,自己是做不动这个问题了,就将希望留给大家吧。因为几大高手之间的激烈论战,会议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

三、观后感想

这次会议既是武林大会,又是思想盛宴。作为一名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者,我觉得三天内经历了多次头脑风暴,估计脑细胞被炸死了不少。对比国内类似的会议,我感慨良多。

第一,会议效率非常高。两天半的议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而且会议通知早在8个月前就发出了,详细议程则在半年前就确定了。组织者精心设计了会议议程,以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论文为切入点,围绕不完全契约在十个主题上的应用和发展趋势,邀请了几乎所有相关的重量级学者,而且在内容上有综述、有评议、有讨论,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推广和推进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

第二,会议代表非常敬业。无论是会场上还是咖啡间,无论是班车上还是饭桌前,所有人在所有见面的时间内都在讨论学术问题,而且他们还都热情洋溢、精力充沛。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在闲聊学术以外的杂事。看来,人家是真把学术当作一项爱好,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第三,会议程序非常平等。尽管格罗斯曼、哈特教授是会议的主角,但是会议并没有安排他们的专门发言(晚餐致辞除外)。每一个单元的综述者、评论者和讨论者,都是根据学术成就的大小来挑选的,而不是根据官位、职称或名气来挑选的。所有人发言都要举手,多人举手时要按先后顺序,有人抢话筒时会遭到他人自发的批评。会议闭幕时,还安排阿庚教授等人给参与会务活动的两位女职员献花致谢。多么人性化!

试想,如果类似的会议在中国召开会怎样?肯定先是领导致辞,高官捧场,然后各路嘉宾按照职位大小一一献上赞歌,至于年轻讲师、博士,那肯定没有发言资格。最后,在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氛围中,领导致闭幕词,会议胜利闭幕。当然,还有旅游安排。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做到“让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五彩缤纷的女性经济学

封 进

2011年6月由国际女性经济学协会(IAFFE)主办的第20届国际女性经济学年会首次在中国召开,有近三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参加。奇装异服的女性经济学家中间,也点缀着少量衣冠正式的男经济学家。我第一次参加这一盛大的聚会,感触良多。我不想用“学术盛会”这样的词来形容,因为会议的内涵远不止学术这一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五彩缤纷,不拘一格”,会议中报告的许多文章从内容到范式都有新鲜之感,既有活泼轻松的,又有纷繁复杂的,传递的信息量很大。另外,女性经济学家的热情也令我肃然起敬。大会第一天的主题演讲结束后是提问环节,几十位女经济学家在中间过道的话筒前排起一列长队,挨个提问或评论,每一位都激情四射,滔滔不绝,后面的人排队时间要超过一小时。即使到了第三天,各分会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没什么人提前离开。其实,女经济学家在此体现了女性的一些特性:更愿意合作,更遵守规则。

说到女性经济学,很多人第一反应恐怕会和女权主义相联系。事实上,1992年在荷兰召开的第一次年会,即IAFFE成立之时,对于采用女性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还是女权主义经济学(Feminism Economics)有过讨论,最后采用了女性经济学,其含义是提倡从女性视角研究有关的经济问题,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纠正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女性视角。但不少人都有些困惑:第一,女性视角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与性别研究(gender study)有什么区别?第二,女性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属于非主流?在两天半的会议中,我有机会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对女性经济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会议有一个专门的圆桌会议,讨论何为女性经济学研究。在加拿大任教的董晓媛教授做了一个特别的演讲,题目为:“女性经济学不仅是在回归中加一个性别变量”。有经济学家做了一个文献综述,回归了在1947~1995年间发表在顶级劳动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发现在模型中加入“性别哑变量”的文章数量有上升趋势,而考虑到“性别哑变量和其他变量做交互项”的文章数量有下降趋势,作者解释这正是为了控制性别的影响。然而,这种趋势实际上是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行为背后所遵循的理论或逻辑是一致的,性别只对所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有边际上的改变,并



没有本质的差异。显然这不符合女性经济学对于男女在个人权利、能力、福利等方面差异的理解。其实,即使加入性别和其他变量的交互也不足以揭示现实社会中女性面临的问题。女性经济学研究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分析框架,从女性的视角分析决策过程、约束条件、福利的决定因素,解释男性、女性以及儿童在资源拥有和行动模式方面的差异,从而改变女性利益受到忽视的状况。

有种观点认为女性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基础的理论的质疑。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全面。首先,女性经济学并不否认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女性问题的特殊性,其目的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补充。例如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性劳动基本上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包括家务劳动、生儿育女、幼儿照顾等。再生产活动由于缺乏市场价格,因而难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忽视了女性的劳动价值。这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的家庭资源配置。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家庭中,女性的医疗支出常常高于男性。按照主流理论,男性健康投资的市场回报更高,应该男性的医疗支出更高。但事实上,女性的健康投资关系到下一代,家庭会将更多医疗资源用于女性,尤其是20~40岁阶段的

女性,因此,非市场价值在家庭决策中会有所体现。另一个后果是,忽视再生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会导致相关公共政策的缺失,家庭和社会的价值观使得女性长期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女性经济学强调了再生产的价值,致力于评估女性的时间分配、非市场劳动的价值,以及如何通过再分配政策保障女性的经济利益。

再如,大量的文献对工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解,比较二者教育回报率的差异,估计歧视的程度等。然而女性经济学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女性遇到的问题和西方国家的女性不同,简单看收入并不能反映女性的福利,产权和土地所有权是决定女性经济地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各国在土地分配和继承方面有着各种复杂的规则,在南亚国家女性为了能够获得土地所有权,更可能选择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因而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用于解释贫穷的农村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特殊性,保障妇女土地权益和非农劳动参与的政策研究是女性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次,女性经济学通过其独特的视角,不断深化主流经济学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明瑟、贝克尔和格罗创建了新家庭经济学,贝克尔的代表作《家庭论》开创性地将家庭经济活动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在“经济人”中加入了利他主义,认为

利己主义是指导市场行为的动力,利他主义却是指导家庭内部资源的动力。在家庭成员目标一致的假设下,在家庭内部丈夫从事市场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专业分工是由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而在家务劳动上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比男性高,因而家庭内的专业分工优化了家庭资源配置。女性经济学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第一,贝克尔夸大了家庭成员利益的一致性,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发生冲突时,其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因为男性从事的市场劳动是有偿的,而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家务劳动的专业化使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与男性通过劳动力市场积累的人力资本相比,女性在照顾家庭时人力资本投资更容易贬值。所以男女分工专业化程度越高,女性在家庭讨价还价的能力越差。许多研究发现,照顾孩子会减少参与市场劳动的女性的终身工资水平,学者们将此称为“母亲税”。第二,贝克尔的家庭分工理论夸大了家庭资源配置的效率。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弱于男性,因此,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不一定按照贝克尔家庭分工理论所预计的那样。

现实社会的发展表明,女性经济学者对家庭资源配置的理解更加符合实际。最近贝克尔自己的研究发现,过去20年,

在几乎所有国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都有了大幅提升。目前,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约有57%是女性,而且有60%的硕士学位被授予女性。另一方面,高中女生辍学率比同龄的男孩要低,而高中辍学者的收入会非常低。加之美国女性更有可能获得硕士学位,而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往往比只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人挣钱多得多。因此,男女工资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女性超过男性,劳动力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并不以性别划分,全职家庭主妇的比重也迅速下降。

再次,女性经济学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但女性经济学所需要考察的变量比传统调查数据更为丰富。Feminist Economics这本杂志已经属于影响力较大的SSCI期刊,引用率逐年上升,它倡导的理念之一正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女性经济学问题”,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已经在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女性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其中的一些独特的变量对于理解性别差异的运行机制十分有帮助。例如研究工资性别歧视时,通常采用回归分解方法,并将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不能解释的部分归为歧视,并估计歧视的程度。这一方法的缺陷是无法得知歧视是怎样产生的。女性经济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尝试将造成歧视的原因用特有的变量度量,一个例子是



调查一组变量反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可及性,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十分显著,而残差项的贡献明显减少。这说明在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可及性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原因之一,并视作歧视的一项内容。

抛开主流或非主流的争论,许多女性经济学的研究显得通俗而富有人情味和趣味。这次年会听到了很多新鲜的内容。有一篇是探讨当前金融危机的,题目是:“如果女性领导世界是否还会出现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治家、金融家和企业家都是男性,在他们的领导下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换了女性领导,她们对金融活动会更加谨慎,处理经济事务更加有效率,风险意识更强,结果真可能会不一样。有不少文献发现女性在股市的回报率高于男性,小额贷款银行成功的例子也证明女性的理财能力和对风险的态度是值得借鉴的,这种银行的客户90%都是女性,其违约率非常低。IMF新总裁选择了一位女性,不知是否与此种观点有关。还有些是研究女性生育权的,比如解释中国农村家庭“为什么有很大很大的姐姐与很小很小的弟弟”这样的现象。老外们对此很感兴趣。有文章生动描述了各地区女性的生存状况,比如介绍了斯里兰卡的乡村生活政策对女性的

影响。这些政策希望保障女性在集体决策中的作用,乡村中有董事会、金融委员会、产品收购委员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储蓄和信贷委员会等一套系统。乡村生活有简单的一面,更有复杂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一篇是考察菲律宾编织业的经营和文化,展示了女性在工作和决策中的特点。还有从女性经济学视角探讨环境保护的,如女性的参与能否改善森林保护、女性在环境再生产中的作用等。基本意思是把女性在对人的照顾(如老人和孩子)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所花的时间与其对环境的照顾相联系,女性更能坚持,更愿意奉献,更能够遵守规则。这些都对于环境保护有帮助。所以,在环境保护领域女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很多有趣的观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IAFFE网站。

经济学研究早已独树一帜,大师云集,源远流长。作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当然要从经典理论和大师那里获取知识。不过这还不够,恐怕还需保持一份朴素的好奇心,抛开一些功利的束缚。女性经济学正是在走一条自己的路,可能还没有高深的理论,也并不需要复杂的技术,研究方法和内容似乎还未成体系,但不能否认其深刻的洞见和强烈的责任感,对社会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说审稿

陆 铭

近日,因为审稿,以及收到的审稿报告,想起一些话,说给大家听听。

前两天,我将自己写的一份审稿报告和收到的一份审稿报告放在一起,在学生面前晒了晒。我对学生说,你们或早或迟,会成为审稿人,也会在各种报告会上批评别人的文章。那么,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个C和两个P:constructive、professional、careful、polite。

审稿总是要批评的,批评是容易的,难的是建设性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实证研究,世人皆知,模型误设(mis-specification)、度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内生性(endogeneity)是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从这三个角度去批评文章,基本不会错。但是,一份审稿报告如果只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怕是恰恰说明审稿人除了教科书之外,对所审的文章没有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篇文章的模型形式应基于理论与文献,变量的度量应该是在研究之前已经充分考虑的问题,内生性的解决并不容易,有经验的作者不会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考虑。作为审稿人,我更愿意告诉作者这样一些信息:他的研究中有一个闪亮的地方,他没有意识到;他遗漏了重要的文献;他能够找到某个数据,从

而可以看看从X到Y的某个机制,甚至可以检验几种机制哪个更重要;或者,从X到Y的机制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在历史和现实中,故事是另一种可能性,更接近真实的制度背景;我可能还会建议作者,在一篇学术论文中,不要将政策建议讲得那么多;我还会建议作者对于文章的引言部分换个写法,会使得他的工作更加重要和有趣……我会尽量要求自己所提的建议是可以做到的,从而使审稿意见具有“建设性”。我不会对一篇研究收入差距对某个事物的影响的文章说,收入差距是内生的,你应该用实验数据去做,因为用实验方法来改变收入差距,不说是不可可能的,也至少是不道德的。我也不会建议作者运用自然实验的数据来研究户籍的影响,因为我知道,随机地给农民工发放城镇户籍,这件事从来没有过。

对于耗费了经济学家大量精力的内生性问题,我想多说两句。我绝对认为克服内生性偏误是重要的,也是研究者应该努力去做。不过,我的想法是,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因果关系识别在理论上并无直接对应关系。计量的研究策略(包括实验方法、IV、regression discontinuity、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D等等)都只是用来避免



(或缓解)由遗漏变量或双向因果关系所产生的估计偏误的。在使用了这些方法之后,研究者所看到的相关性更接近因果关系,而其是否真是因果关系,仍然需要看理论逻辑。因此,我不认为运用OLS方法分析截面数据的研究就一定不好。事实上,只要研究策略得当(比如运用了实验或自然实验的方法),从而保证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外生性,OLS恰恰是最好且有效的估计。一些顶级杂志的文章也常常在OLS的基础上,运用一些研究逻辑来排除某些作用机制,从而更好地接近因果推论。另外,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往往是从看相关性起步的,此类研究的重要意义往往在于提出了具有创见的问题。当然,如果能够用更接近于因果分析的研究策略,则是锦上添花。

是不是可以简单地从研究方法来判断研究的价值?方法是重要的判断标准,但恐怕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举个例子吧,党员到底代表什么?是能力还是权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用同卵双胞胎数据,做一下双胞胎之间的数据差分,那么,同卵双胞胎的能力作为遗漏变量就被差分掉了。如果同卵双胞胎之间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两者之间的收入有差别,那说明党员的确不只代表能力。如果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党员身份差别没带来收入差别,那就只能说,通常在截面上看到的党员身份回报只是因为党员的平均能力更

高而已。最近,我审的一篇文章运用截面数据的OLS分析发现了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之间有替代性,做法是将两者相乘做个交互项,发现在收入方程里这个交互项的系数是负的。对此,我当然可以批评作者,说教育和党员都是内生的,然后,建议他应该用双胞胎数据做一下。可是我没有,因为我相信,在理论上,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是否是相互替代的,这是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恰恰因此,即使党员和能力相关,那么,当收入决定方程遗漏了能力的时候,也遗漏了能力与教育的交互项。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是使用双胞胎数据进行差分,在残差项里的能力与教育的交互项也是差分不掉的。而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是相互替代的,即使其系数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只要符号方向不错,那么,就可以质疑“党员仅是能力的代表”这一说法。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并且文献已经告诉我们能力与教育是互补的,那么,党员和教育就不会是互替的。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我建议作者将这一发现及其对于理解党员身份的性质的文献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亮点来说。

顺便再说理论和实证的关系。有人认为,必须在实证前面加个数学模型才能将机制讲清楚。甚至认为,在统计相关性之前,加上个数学模型才可以确认因果关系。读者不妨自己统计一下,在经验研究性质的经济学论文中有多少比例的文

章并没有一个数学模型。比较一下有数学模型的和没数学模型的论文就知道,不能简单地批评说,没有数学就是没有理论。即使没有数学,实证研究对于模型设定、变量选取等等,仍然需要依赖于“理论”。但是,至少有两种情况,使得实证文章中并不需要写一个用数学表示的理论模型。第一,既有的理论已经很成熟,实证要做的,只是看从X到Y的净效应有多大,到底哪种机制是成立的。第二,实证所要看的机制实在是太直接,不需要用一个数学模型表述的理论,而这个有待检验的关系本身是否成立才是研究者关心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检验一下教育里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即一个人的学习成绩是否受到其同学成绩的影响。这个看似简单的关系在实证检验中却非常难做,而且这个“同群效应”是教育经济学的基石。更广泛地说,基于社会互动的人类行为的相互依赖性是社会经济学 (social economics) 的基石。那么,对于一个从X到Y的统计关系,是否必须以一个数学表述的理论来作为其因果推论的前提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就要追问两个问题:对于一个统计上的X与Y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写一个X影响Y的理论,也可以写一个Y影响X的理论,我们是否仅以此就能确认在统计上的关系到底是X到Y的因果链,还是反过来?与利用某种实证研究策略(包括实验方法、IV、regression

discontinuity、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D等等)看到了X对Y的影响相比,一个用数学表述的理论加上“从X到Y”的相关关系,是否更能用来确认X与Y之间谁因谁果?

说完constructive,再说professional就容易了。正如陈凯歌在电影《和你在一起》中批评他学生说的那句,“都对,但是不好。”专业的审稿报告就应该是富有建设性的,这说明,在审稿人的研究内,他知道他审的这项研究可以做得更好,而且这不是外行话。为此,好的审稿人不应轻易地接受非自己熟悉的领域的审稿要求,否则,说外行话就在所难免。我对“professional”的理解就是,审稿人与作者同样知道,甚至比作者更知道研究的前沿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技术永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好的审稿人不应该只是告诉作者存在某项技术,而是清楚地知道一种技术(或者研究策略)是否适用并且可行,从而值得推荐给作者。对了,我不应该忘记说一句,好的审稿人还应该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业精神,那就是审稿的时间不要超过杂志所要求的时间,至少我自己一直这样要求自己,因为我将接受审稿的邀请作为对杂志和作者的承诺。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自己曾经有过两次经历,文章的两轮审稿经过了近2年时间。没有任何一家中文杂志说这是允许的,只能说,这是审稿人不够



有职业精神。尤其是当我看到审稿人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的审稿报告里,提醒我被解释变量(Y)的度量误差会引起系数估计的“衰减偏误”,我只好提醒自己“笑比哭好”,因为,事实上,“衰减偏误”只会解释变量(X)存在度量误差时出现。

其实,所谓“careful”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审稿时不要自己出错。在我看过的中文杂志的审稿报告中,另一个常常出现的错误是,审稿人提出作者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其实,如果解释变量完全没有共线性,那么,就不需要多元回归技术来分析问题了,遗漏变量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当然,高度相关的解释变量同时放在模型里,会使各变量的系数出现不显著的情况。这时,请不要轻易丢掉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否则,当你这样做时,虽然剩下的变量系数显著了,但它的系数却可能存在估计偏误,因为,你把与它相关的变量放到模型的残差项里去了。通过减少解释变量的个数来增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这只能在问题足够重要、样本又非常小,而且作者只关心系数的方向时才可以,不过,现在这很难成为让人接受的理由。此外,好的审稿报告,不妨仔细帮作者找他文章中的错误,包括文字、格式与标点,更不用说表述上的欠妥之处了。

最后,Please be polite。你可以拒绝审一篇稿,如果你实在觉得文章没有改好的

可能,写审稿意见也是浪费时间。我对于自己接受审稿邀请的文章,绝不会说其中存在的错误够得上“愚蠢”、“幼稚”之类的形容词。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在职业生涯上起步的年轻学者来说,告诉他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就够了,审稿报告不需要任何形容词。我自己也犯过错,在发表过的文章里,还存在着因为不够仔细而导致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不过,我总是觉得,有错是可以改的。不能明知故犯,更不能知错不改。

我写这篇随想是要对国内的审稿提点建设性的批评,就像我认为写审稿报告也尽量建设性一样。学者的基本职责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其方式无非三种:第一种是自己创作;第二种是培养学生,让学生延续自己的创作;而审稿则属于第三种,即通过帮助他人来生产和传播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审稿是值得学者投入精力的事,尽管这只是在创造某种正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之所以成为“外部性”是因为这项工作不能直接给自己带来回报,所以,太认真也难免显得有点傻。不过,学术就是这样的职业,傻事做不做,做得如何,完全看你自己。不管怎样,作为审稿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比别人聪明,如果真要证明点什么,你就去证明,你的意见可以切实地帮助作者做得更好。我就是这样想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